

# 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

哈全安

**【提要】** 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此消彼长,是 20 世纪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的膨胀无疑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滥觞则是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日趋膨胀的逻辑结果。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矛盾运动,即巴列维时代什叶派传统宗教势力的衰落、世俗政治的强化与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广泛发展以及后霍梅尼时代非伊斯兰化的初步政治倾向,构成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为伊朗现代政治模式的走向成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标志着伊朗的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阶段。

**【关键词】** 伊朗 现代化 世俗政治 宗教政治 巴列维 霍梅尼

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长期并存,是伊朗传统社会的突出现象。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错综交织和激烈对抗,则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特征。巴列维王朝无疑构成伊朗现代化进程中世俗政治的典型代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法基赫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宗教政治在现代伊朗社会的广泛实践。许多研究者强调世俗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同步倾向和必然联系,将巴列维王朝的两代君主视作伊朗现代化的实践者,而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法基赫制度的建立视作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在伊朗长期处于共生状态,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本文试图以 1905—1911 年宪政运动以来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矛盾运动作为切入点,结合特定的社会背景,探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历史模式,并就上述观点及相关问题略陈管见。

—

20 世纪是伊朗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而 20 世纪伊朗历史的核心内容在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抑或现代化进程中诸多层面的深刻变革。1905—1911 年,伊朗各界民众掀起规模空前的政治浪潮,组建议会,制定宪法,旨在反抗恺加王朝的封建统治,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是为宪政运动。宪政运动根源于伊朗传统社会的深刻危机,强调限制君主权力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进而改造伊朗传统的社会秩序,表现为现代模式的政治运动,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宪政运动将议会和宪法首次引入伊朗政治舞台,赋予民众以选举

的权利,对于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加以限制,规定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则,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传统因素的根深蒂固和旧社会力量的悬殊对比,加之西方列强的直接干涉,从根本上决定了宪政运动的失败,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然而,宪政运动毕竟开辟了伊朗现代政治革命的先河,预示了伊朗历史发展的崭新方向,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宪政运动主要表现为城市范围的政治运动,没有波及到乡村社会;农民和游牧群体尚未介入宪政运动,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尽管如此,宪政运动无疑是伊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教俗势力的广泛联盟构成宪政运动的社会基础,巴扎、行会和清真寺则是宪政运动的重要据点。特定的社会现实给宪政运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教俗精英分享议会席位,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信仰构成宪法的基础。议会的构成和宪法的制定包含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二元倾向,体现宪政运动的复杂社会构成和教俗势力的相互妥协。“1906年宪法”作为伊朗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和宪政运动最重要的历史遗产,确定了教俗群体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原则,进而对其后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1925年,伊朗第五届议会宣布废黜恺加王朝的末代君主,建立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形式与伊朗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两者的结合。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在伊朗政治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世俗化构成伊朗政治演进的主流倾向。所谓世俗政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不可一概而论。巴列维时代伊朗的世俗政治,包含排斥教界传统政治影响和强化君主统治地位的双重倾向。排斥教界传统政治影响和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并非孤立存在的历史现象,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排斥教界传统政治影响的目的是服务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的客观需要,而政治世俗化的逻辑结果则是极权政治的日趋膨胀。换言之,所谓的世俗政治,在伊朗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为打破传统社会权力分配的二元结构,削弱宗教政治,强化政府职能,进而完善巴列维王朝君主独裁的极权政治。君主政治构成世俗政治的外在形式,世俗政治、君主政治和极权政治的三位一体则是巴列维时代伊朗政治的基本模式。

里萨汗当政期间,长期奉行世俗政治原则,司法改革和教育改革构成巴列维王朝排斥教界传统势力的重要举措。恺加时代,伊朗的司法体系处于二元状态,国王控制的世俗法庭与什叶派欧拉玛控制的宗教法庭长期并存;“1906年宪法”亦承认教界独立的司法地位,赋予什叶派欧拉玛在司法领域的广泛权力。巴列维王朝建立后,里萨汗屡屡强调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审判的世俗原则,引进法国的“民法”和意大利的“刑法”,颁布新的“商业法”和“婚姻法”,修订沙里亚中若干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文,完善世俗审判体系,确立司法部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地位,缩小宗教法庭的审判权限,进而削弱什叶派欧拉玛在司法领域的传统影响<sup>1</sup>。与此同时,里萨汗实行教育改革,兴办世俗学校,发展世俗教育,极力排斥什叶派欧拉玛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此外,里萨汗恢复实行古代伊朗的传统历法,取代伊斯兰历法,作为巴列维王朝的官方历法。里萨汗还颁布法令,要求伊朗人身着西装,头戴巴列维帽,废

<sup>1</sup> E.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1982, pp. 140-141; A. Banani, *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 1921-1941*, Stanford, 1961, pp. 79, 118.

止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传统服饰,禁止穆斯林妇女披带面纱<sup>1</sup>。1925年,什叶派欧拉玛在议会尚有24个席位;至1940年,教界议员已无一人<sup>④</sup>。里萨汗当政期间伊朗世俗政治的发展还表现为君主权力的强化,而军事力量的扩充和官僚机构的完善构成里萨汗强化君主权力的基本举措。新的兵役法扩大了士兵的征募范围,城市、乡村和游牧部落为巴列维王朝提供了充足的兵源<sup>④</sup>。另一方面,里萨汗不断完善官僚机构,将全国划分为11个省49个县,省和县的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自近代以来,国家权力第一次超出首都的范围,出现在外省的城市和乡村”<sup>1/4</sup>。里萨汗当政期间排斥宗教政治和强化世俗政治的逻辑结果是极权政治的长足发展;首都和宫廷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所在,国王则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君主。选举产生的议会依旧存在。然而,国王提名议员的人选,交由地方选区表决通过,议会选举的整个过程始终处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下。议会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徒具形式,成为极权政治的点缀和御用的工具。至于首相和内阁成员,亦由国王确定人选,交议会表决通过;首相和内阁成员的去留,取决于国王的是否信任,而不是取决于议会的态度。此外,里萨汗实行党禁,解散工会。里萨汗当政期间,民族主义是伊朗世俗政治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内容在于宣扬所谓“王中之王”的统治曾经创造了伊朗辉煌的古代文明,伊斯兰教则是泊来的信仰,以强调伊朗的历史传统取代强调伊斯兰的历史传统,进而以强调国王的权力和尊严取代强调安拉的权力和尊严,国王俨然成为伊朗民族的象征和国家的化身。

1941年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即巴列维国王即位以后,王权衰微,社会动荡,部落酋长、在外地主、教界上层和世俗知识分子纷纷登上政治舞台,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形成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君主政治多元并存的复杂局面。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重新控制国家权力,进而采取亨廷顿所谓的“发展的独裁模式”<sup>1/2</sup>,凭借丰厚的石油收入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着力强化极权政治,装备精良的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则是巴列维国王实行极权政治的有力工具。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伊朗军事力量急剧膨胀,军队员额从12万人增至41万人<sup>1/4</sup>。巴列维王朝的军队是伊朗社会中的特权阶层,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国王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亲自任免高级将领,参与军事演练,并且经常身着军装主持国务活动。始建于1957年的国家安全情报署由为数众多的秘密警察组成,作为军人统治的重要补充,是巴列维国王的“耳目和铁拳”。国王控制军队,军队通过控制政府进而控制整个社会,是为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的重要形式。与此同时,巴列维国王不断强化政府职能和完善官僚政治,中央政府由12个部增至19个部,政府雇员由15万人增至56万人<sup>⑧</sup>。国家权力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传统地方势力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国家权力的广泛扩张而不复存在。所谓的白色革命抑或“国王与人民

<sup>1</sup> G. Lenczowski, *Iran Under the Pahlavis*, Stanford, 1978, p. 99.

<sup>④</sup> J. Foran,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Boulder, 1993, p. 223.

<sup>④</sup> E.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 136.

<sup>1/4</sup> E.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 137.

<sup>1/2</sup> S. 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5—241页。

<sup>1/4</sup> E.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 420, p. 435.

<sup>⑧</sup> S. A.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Oxford, 1988, p. 94.

的革命”，既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亦是巴列维王朝世俗政治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土地改革作为白色革命的核心内容，触及约占全国耕地面积 30% 的宗教地产瓦克夫，严重削弱了传统教界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什叶派欧拉玛在司法领域和教育领域的统治地位由于所谓“知识大军”和“公正之家”的建立而遭到广泛排斥，其在伊朗社会的政治影响丧失殆尽。与此同时，政府强化控制神职教育，极力使伊斯兰教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御用信仰，实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巴列维化<sup>1</sup>。政党政治无疑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政党政治并非民众分享国家权力的社会形式，却成为极权政治的手段和君主独裁的工具。1959 年，巴列维国王宣布实行两党制，授意组建国民党和民族党。1964 年，巴列维国王废除两党制，合并国民党和民族党，组建新伊朗党。1975 年，复兴党取代新伊朗党，成为伊朗唯一的合法政党。复兴党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据称拥有党员 600 万人，包括议会和内阁的所有成员。复兴党的主要任务是铲除背离官方理论的思想倾向和实现伊朗人民的思想统一，而拥护宪法、君主制度和白色革命则是加入该党的先决条件。复兴党宣称，巴列维国王不仅是伊朗国家的元首，更是伊朗民众的精神领袖。至于什叶派欧拉玛，则被复兴党视作反对巴列维国王和白色革命的政治势力，是“中世纪的黑色反动派”。

巴列维时代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世俗政治的空前发展和经济社会领域现代化的长足进步；两者的并存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巴列维时代伊朗的世俗政治主要表现为里萨汗和巴列维国王两代君主的极权政治，而巴列维王朝的极权政治则是推动伊朗经济社会领域现代化长足进步的有力杠杆。恺加王朝末期，伊朗社会犹若一盘散沙，经济凋敝，危机四伏。1925 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以后，现代化进程逐渐启动。“在里萨汗的独裁统治下，西方的现代化借助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被引入伊朗”<sup>④</sup>。里萨汗当政期间，军队的扩充和官僚机构的完善是强化极权政治的先决条件，开辟财源则是扩充军队和完善官僚机构进而强化极权政治的客观需要。对于货币的渴望和财富的追求，驱使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者致力于改造伊朗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换言之，经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举措出自强化极权政治的物质需要，而极权政治的强化则是巴列维王朝现代化改革的宗旨所在。里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初步的工业化进程。1963—1971 年的白色革命，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极具影响的历史环节<sup>⑤</sup>。巴列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的主观目的，无非是在标榜现代文明的招牌下强化和完善君主独裁的极权政治。然而，白色革命的客观后果却是导致伊朗社会的剧烈变革。白色革命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摧毁了乡村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为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充分体现了巴列维王朝的极权政治和国家权力作为上层建筑在推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

<sup>1</sup> M. M. Milani, *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Boulder, 1994, p. 63.

<sup>④</sup> M. Parsa, *Social Origins of Iranian Revolution*, London, 1989, p. 37.

<sup>⑤</sup> 详见哈全安：《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 二

自 1501 年萨法维王朝建立开始,什叶派取代逊尼派成为伊朗的官方信仰。什叶派不同于逊尼派,属于穆斯林社会中的少数派,在中世纪曾经长期被排斥于哈里发国家的政治舞台。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教俗并立的二元倾向和独立于世俗政治的宗教政治逐渐成为什叶派区别于逊尼派的显著特征,伊玛目学说则是广泛影响什叶派穆斯林政治生活的信仰原则。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只有欧拉玛才是沙里亚的体现者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至于国王的统治只能局限于世俗的范围。恺加时代伊朗政治的突出现象,在于世俗君主与什叶派教界的权力分享;首都德黑兰无疑是宫廷的所在和世俗权力的中心,圣城库姆则是欧拉玛的据点和宗教权力的象征。尽管如此,伊朗的什叶派教界不同于西方的天主教会,并非浑然一体,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其与宫廷之间关系各异,或与宫廷保持密切来往,接受国王的赐封,充当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纽带,或远离宫廷,以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宪政运动集中体现了什叶派欧拉玛在伊朗社会的广泛政治影响;“1906 年宪法”的相关规定,诸如承认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伊朗官方的宗教信仰、由欧拉玛上层即穆智台希德组成的最高委员会享有监督议会和政府的绝对权力以及沙里亚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标志着伊朗传统政治模式的延续。

巴列维时代,伊朗宗教政治的主要内容是传统宗教政治的衰落和现代宗教政治的兴起,而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激烈对抗无疑构成传统宗教政治衰落和现代宗教政治兴起的客观基础。白色革命前夕,什叶派传统的宗教政治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政治处于共生的状态;1925 年里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和 1953 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皆曾得到什叶派欧拉玛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什叶派传统的宗教理论构成巴列维王朝的御用学说,什叶派传统的宗教政治则是巴列维王朝世俗政治的延伸和补充。另一方面,什叶派欧拉玛长期构成伊朗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伊朗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采用传统经营方式的宗教地产瓦克夫是什叶派欧拉玛的主要经济来源,清真寺与巴扎的广泛联盟则是伊朗传统宗教政治的社会基础。什叶派传统教界与巴列维王朝两者之间不无矛盾;里萨汗和巴列维国王两代君主的世俗化倾向,特别是白色革命的相关举措,导致什叶派传统教界的不满和反抗。尽管如此,什叶派传统教界毕竟构成君主政体的历史参与者和传统政治模式的重要社会基础,什叶派传统教界对巴列维王朝的不满和反抗大都局限于传统秩序的框架之内,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举措和白色革命以及强调“1906 年宪法”所规定的宗教政治原则是什叶派传统教界与巴列维王朝之间矛盾的焦点所在,承认传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什叶派传统教界的基本纲领。巴列维时代伊朗历史的深刻变革瓦解着什叶派传统宗教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世俗政治的膨胀导致什叶派传统教界的政治影响日渐衰微。

自 60 年代开始,现代宗教政治在伊朗社会悄然兴起,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传播则为现代宗教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巴列维王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传统什叶派构成处于官方信仰的地位,现代宗教政治主要表现为民间色彩的宗教思潮和宗教运动。1963 年教界政治风波平息以后,民众建立的宗教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布伊朗各地,进而挑战传统

什叶派作为官方信仰的统治地位<sup>1</sup>。新兴民间宗教组织大都具有行业背景或地域背景,在中下层巴扎成员和来自乡村的城市贫困人口中颇具影响,成为凝聚民众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什叶派教界的传统理论是伊朗传统社会的客观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与传统社会群体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思想,崇尚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其核心内容在于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符合下层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是颇具革命倾向的宗教学说和政治理论。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早期倡导者阿里·沙里亚蒂认为,早期的伊斯兰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古兰经》则是规定穆斯林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的蓝本;自16世纪起,什叶派蜕变为历代王朝统治人民的官方学说和君主制度的舆论工具,而现存的伊斯兰教恪守传统的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僵化的神学理论;应当摒弃教界传统理论,回归经训的道路,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实现安拉与人民的原则,建立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秩序。阿里·沙里亚蒂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伊斯兰教,即统治者的伊斯兰教和民众的伊斯兰教抑或萨法维王朝的伊斯兰教和阿里家族的伊斯兰教,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反抗邪恶的统治既是伊玛目的事业,更是所有穆斯林的神圣职责。在阿里·沙里亚蒂看来,伊斯兰教的精髓在于生命的奉献;阿里·沙里亚蒂的名言“殉难是历史的核心”和“时时都是阿舒拉,处处皆为卡尔巴拉”,在后来的伊斯兰革命期间成为广泛流传的政治口号。1963年,阿亚图拉霍梅尼向巴列维国王发难,谴责巴列维国王违背宪法、亵渎信仰和出卖国家利益,将巴列维国王比作杀害伊玛目侯赛因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叶齐德,号召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朝,进而成为伊朗政坛的风云人物和倍受民众拥戴的宗教领袖,甚至被誉为“波斯的伊玛目”<sup>④</sup>。自60年代末开始,霍梅尼进一步发展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理论学说,倡导宗教政治化的思想原则,强调宗教应当超越信仰的范围而走进政治领域,将宗教视作反对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政治武器。霍梅尼认为,世俗政治与经训阐述的原旨教义不符,君主制度背离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在伊斯兰教中,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王朝的世袭”,“伊斯兰教与君主制的全部观念存在根本的对立”<sup>⑤</sup>,只有推翻世俗化的君主制度,重建教俗合一的神权政体即伊斯兰政府,才能摆脱独裁专制,保护“被剥夺者”的利益,实现社会秩序的平等和民主。霍梅尼声称:“伊斯兰政府不同于现行的其他政府形式……伊斯兰政府不是专制的,而是立宪的……我们的义务是拯救被剥夺者和被虐待者。我们有责任帮助被虐待者和与压迫者斗争”<sup>⑥</sup>。

1977—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既是民主与专制长期较量的历史产物,亦是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激烈抗争的逻辑结果。巴列维时代,新兴社会群体与传统社会势力之间无疑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巴列维王朝的独裁专制与民众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倾向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其他层面的次要矛盾,导致反对

<sup>1</sup> S. A.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p. 92.

<sup>④</sup> S. A.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p. 101.

<sup>⑤⑥</sup> D. Hiro, *Holy Wars: The Ris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New York, 1989, p. 161.

<sup>⑦</sup> L. Davidson, *Islamic Fundamentalism*, London, 1998, pp. 136–138.

巴列维王朝的诸多群体在争取民主的政治基础之上形成空前广泛的联合。个人权力极度膨胀的巴列维国王,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民众的公敌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众矢之的。霍梅尼的政治思想,表面上包含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内容,看似截然对立,实则不然。霍梅尼主义借助于回归宗教的传统形式,阐述独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现代政治理论,强调以安拉的尊严取代国王的尊严和以神圣的宗教权力取代国家的世俗权力,代表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诸多群体,包括传统社会势力和新兴阶层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伊斯兰革命期间凝聚民众的主导思想和反抗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理论。霍梅尼作为什叶派现代宗教政治的灵魂人物,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民主的化身。民主主义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构成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相比,1977—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突出特点在于教俗各阶层广泛的政治联合,而正是教俗各阶层的广泛政治联合,改变了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的历史结局。伊斯兰革命的性质,并非教界传统势力与世俗政治的对抗抑或什叶派欧拉玛与巴列维国王的较量,而是具有深刻影响的宗教革命抑或宗教形式下各界民众反抗独裁专制的政治革命。

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着力规定法基赫制度的政治框架。霍梅尼的追随者声称,所谓三权分立的原则纯属西方的政治概念;在伊斯兰的政治概念中,所有的权力具有共同的来源,法基赫理应成为至高无上的国家领袖。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法基赫作为隐遁伊玛目的代理人享有治理国家的绝对权力,支配所有的政府机构,统率军队,决定战和,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半数成员和最高法官直至罢免总统。根据伊斯兰宪法,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总理作为行政首脑对议会负责。“1906年宪法”规定,国王必须尊重民众的意志和遵守宪法以及在议会接受政府的就职宣誓。相比之下,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赋予法基赫以凌驾于民众意志以及宪法和议会之上的特殊地位;法基赫的罢免权只属于宪法监护委员会,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半数成员却由法基赫任命,另外半数成员则由法基赫任命的最高司法委员会提名并由议会推选。法基赫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宗教政治在伊朗社会的广泛实践,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所阐述的什叶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亦随之由巴列维时代的民间信仰转化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理论。

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化无疑是伊朗社会的突出现象,而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化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关于妇女服饰的严格规定。妇女身着伊斯兰传统服饰,在巴列维时代意味着对于世俗君主专制的消极反抗,而在霍梅尼时代具有明显的强制倾向。然而,妇女服饰的强制规定不足以证明法基赫政府回归传统的复古倾向;与巴列维时代相比,在霍梅尼时代,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进学校,走向社会,日益增多的中下层妇女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sup>1</sup>。另一方面,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常被视作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化的重要内容,而霍梅尼时代伊朗经济的严重萎缩亦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现象。但是,将霍梅尼时代伊朗经济的萎缩归因于法基赫政府的伊斯兰化举措,尚不足以令人信服;据此认为伊斯兰革命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进而将法基赫制度取代巴列维王朝视作历史的倒退,亦显片面。历史的发

<sup>1</sup> M. M. Milani, *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p. 203.

展体现为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尽善尽美的结局只能出现于理想之中。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无疑包含着狂热和激进的明显倾向,平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在经济领域的逻辑延伸。然而,狂热和激进的倾向与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具有明显的内在联系,是迄今为止诸多政治革命中的普遍现象,亦是新秩序诞生之际的阵痛。霍梅尼时代,激烈的权力角逐和动荡的政治局面对于伊朗的经济生活显然具有负面的影响,美国的制裁和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则是严重破坏伊朗经济的首要因素。尽管如此,法基赫政府在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如农业生产的进步、乡村电气化程度的提高、教育的广泛发展、数千公里道路的铺设和中下层民众社会地位的改善,亦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 三

综观世界历史,国家机构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强化是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普遍现象,极权政治的膨胀在诸多地区构成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过渡的中间环节。宪政运动作为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起点,包含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相比之下,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历史表现为极权政治日趋膨胀和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双重倾向。里萨汗和巴列维国王两代君主一方面通过世俗化的诸多举措,着力扩充国家机构和完善政府职能,进而强化君主专制,在政治层面构成宪政制度的逆向运动,另一方面借助极权政治的外在形式,致力于改造伊朗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与恺加王朝的明显区别。里萨汗和巴列维国王改造伊朗传统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主观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巴列维王朝君主独裁的世俗政治,无疑中断了宪政运动所开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宪政运动时期所描绘的发展经济和改造社会的宏伟蓝图,正是通过巴列维王朝君主独裁的政治形式得以付诸实践,里萨汗和巴列维国王的极权政治构成推动伊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有力杠杆。在外地主的衰落、封建主义在乡村的日趋崩溃、货币关系的扩大、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的发展以及新兴社会阶层的迅速成长,标志着巴列维时代伊朗现代化的长足进步。

伴随着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巴列维时代的伊朗经历了新旧经济社会秩序此消彼长的深刻变革。里萨汗当政期间,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制约着伊朗国内诸多社会群体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民族主义是伊朗各界民众的共同愿望,巴列维王朝凌驾于社会之上,构成伊朗国家主权的体现和民族尊严的象征。1941—1953年,君主权力一度衰微,社会运动趋于高涨,伊朗政坛形成多元局面。此间伊朗政坛的矛盾对抗大都表现为世俗的形式,议会构成角逐国家权力的主要舞台。“1953年的政变落下了伊朗政治的铁幕,割断了反对派领导人与其追随者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军界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割断了诸多政党与其社会基础之间的联系。此前13年间,诸多政治力量的怒吼震撼着伊朗。此后的24年中,除1960—1963年外,伊朗政坛颇显平静”<sup>1</sup>。然而,巴列维国王君主独裁的铁幕只能掩盖伊朗社会的矛盾对抗。在君主独裁的铁幕掩盖下,伊朗社会的矛盾对抗不断加剧。众所周知,特

<sup>1</sup> E.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 450.



定的政治制度决定政治运动的相应形式,特定的统治模式决定着相应的反抗模式。由于巴列维王朝长期排斥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取缔民间政党,禁止自由结社,世俗形式的政治斗争丧失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势力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宗教的狂热成为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宗教思潮和宗教运动几乎是政治反抗的仅存空间,政治斗争随之逐渐由世俗形式转向宗教形式,清真寺则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主要政治据点。

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无疑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武器。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学说趋于保守和僵化,进而演变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巴列维时代,伴随着伊朗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对抗,什叶派伊斯兰教经历深刻的历史变革,逐渐由官方的学说转化为民众的信仰,由保守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思想。霍梅尼并非“反现代主义的代言人”,亦非“反对整个现代社会”。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旨在攻击教界传统理论及其所维护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其实质在于挑战专制和倡导民主,是颇具革命倾向的宗教学说和政治理论。现代伊斯兰主义自60年代起在伊朗的泛滥,并非霍梅尼个人能力所致,而是根源于伊朗社会的客观需要,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形式初露端倪。作为阿亚图拉的霍梅尼,并非传统宗教势力的代表,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的象征。正因为如此,霍梅尼自1963年起在民众之中久享盛誉,而在教界内部却曾势单力孤。伊斯兰革命的发生,不应简单归结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狂热,而是根源于巴列维时代世俗领域的社会矛盾,其实质在于世俗的社会反抗与宗教的外在形式两者的结合。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宣告了君主政治作为伊朗传统政治模式的寿终正寝。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法基赫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伊朗现代宗教政治的广泛实践。

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在于民主化抑或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由于具体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诸多地区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不同的历史模式。然而,所谓的世俗化并非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内容抑或必要条件,教俗合一亦非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世俗政治在诸多地区的传统社会构成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现代宗教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则是否定传统政治模式的重要手段。强调世俗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同步倾向和必然联系,或者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进而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现代宗教政治的滥觞视作传统的回归抑或现代化的逆向运动即所谓的反现代化,显然缺乏历史依据。在巴列维王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世俗政治的实质在于君主独裁的极权政治,排斥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构成世俗政治的核心内容;世俗化服务于君主独裁的需要,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构成伊朗政治现代化的逆向因素。代议制和普选制的广泛实践在西方诸国固然是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形式,而在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却成为极权政治的点缀和装饰。所谓的政党政治,只是巴列维王朝君主独裁的御用工具,并非广泛体现民众意志的政治形式。相比之下,伊朗现代宗教政治的实质在于通过强调安拉的尊严和隐遁伊玛目的神圣地位,挑战世俗的君主独裁和极权政治。现代伊斯兰主义并非“反现代化基调的和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反抗巴列维王朝和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革命手段。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最初10年,法基赫制度诚然表现出极权政治的明显倾向;霍梅尼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行使绝对的统治权力,而议会和总统

处在从属于宗教领袖的软弱地位。但是,法基赫制度并非“严厉的中世纪式的神权制度”,其本质亦非“传统主义的神权政治”。霍梅尼时代法基赫制度的极权政治倾向根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伊斯兰革命期间尖锐的政治对抗、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由此形成的狂热氛围以及霍梅尼作为民主斗士和革命领袖的社会形象密切相关。伊斯兰革命尽管开始于知识界的发难,却结束于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运动由温和向激烈的转变,导致下层民众政治力量的急剧膨胀,进而提供了伊斯兰革命得以胜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治的激进倾向,贫困状况的改变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则是下层民众的迫切愿望。巴扎尔甘领导的临时政府代表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巴列维时代的经济秩序,维护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被视作保守派的政权和富人的统治,引起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与巴扎尔甘相比,霍梅尼强调保护所谓“被剥夺者”的利益,宣布伊斯兰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被剥夺者”,实现“被剥夺者”的广泛政治参与和财富分享,俨然成为下层民众的代言人,进而获得强有力的社会支持。1989年,霍梅尼针对新的政治局势和客观环境,在弥留之际授意组建宪法修改委员会,修订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强调国家法律高于宗教法律,在行政领域以总统制取代总理制,旨在强化政府职能,服务于两伊战争结束后重建国家的社会需要<sup>1</sup>。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出任宗教领袖,沿袭法基赫制度的神权政体。然而,哈梅内伊并不具有作为克里斯玛式政治领袖的威望和影响,亦不具备霍梅尼所享有的不可替代的绝对地位。与霍梅尼时代相比,哈梅内伊时代伊朗的政治模式出现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在法基赫制度和神权政治延续的同时,世俗倾向逐渐扩大,民选总统日趋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民主政治长足发展。另一方面,极权政治不复存在,激进派、保守派与温和派之间的激烈角逐以及宗教领袖、总统和议会之间权力分配的多元化倾向构成伊朗政坛的突出现象。

(作者哈全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300071)

(责任编辑:刘军)

(责任校对:景德祥)

<sup>1</sup> O. Roy,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 London, 1994, p. 177.

### **The Secular and Religious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Iran // *Ha Quan' an***

The relevant growth of secular politics and decline of religious 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Iran was an outstanding phenomeno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expansion of secular politics under Pahlavis was undoubtedly a key link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 while the beginning of religious politics in al- khumaini era was a logical result of the latter. The conflicts between secular politics and religious politics, namely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power of shi• ah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ecular politics under Pahlavis, and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modern religious politics in al- khumaini era and the initial political tendency of non- Islam in post al- khumaini era, formed the historical pattern of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Iran. The fall of Pahlavis Dynasty opened a road for the matur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pattern in Iran and for th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of the populace. The so- calle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marked a completely new stag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

### **A View on the Juggling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from the Historical Textbook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 *Jiao Runm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Japanese juggling history in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Historical textbook (two volumes), which was compiled by the New sroom of Southern Manchuria Educational Institute , printed in the 8th of April in 1932 and published in the 10th of April of the same year. Since this textbook was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it wholly represented the order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embodied the representative Japanese historical view of imperial country in the period of militarism. Furthermore, when we take a part this historical textbook, we could from the source and tradition find some historical spring- head of thought about juggling the historical textbook in current Japan. To look back history is better 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Japanese juggling the history. This paper not only using demonstrations researches the contents and motives of the juggling history in 1932 but also discuss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the textbook affair in current Japan.

###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Concep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in the La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Wang Xudong***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formatiz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zation, including its emergence and the usage evolution, is not only as a carrier of the predecessors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direct their activities and bring out innovations ; but also as an access of the successors to recognize and deeply considerate when they reviewing, summing up and continuing this history, and plays a role of a historic epistemolog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y.